

为精神价值作神圣的辩护

——读《中国人缺少什么》

■田丽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强之真理的新学热潮。在这个热潮中,有两个人自觉地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哲学。严复是引进英国哲学的第一人,王国维是引进德国哲学的第一人。同为清末民初西方哲学引进中的重要人物,严复与王国维接受西方哲学的取向与遭遇却是大不相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公式给了当时无数中国人以当头一棒,严复也被尊为西学圣人。而国人对于王国维的反应却是异常冷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二人的待遇有如此之大的差距呢?周国平继《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书之后,历时17年再创《中国人缺少什么》,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声名远扬的两位代表性人物——严复与王国维进行了深入剖析与探讨,将严复与王国维两人的西方哲学接受作比较,分析了中国的实用品格,表达了作者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切关心。

时至今日,中国还处在转型的重要时期,各种社会问题仍是层出不穷。毒奶粉、假疫苗等,无数被曝光之后令人咂舌的社会事件的背后,几乎每个人都在追问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都在思考我们到底缺少了什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要想得到答案,我们还需要在严复与

王国维开辟的道路上继续探索。

严王二人在追寻时代的救亡主题时,严复认为中国人最缺少的是法治,他从中西对比中看出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首先最刺痛严复内心的是中西国民素质的巨大差异。在中国人的素质中,令他厌恶至极的,一是自私,二是巧伪。他认为正是这两种在国民中普遍存在的品格,令中国的改革寸步难行。因此,在甲午战败后,严复在斯宾塞和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个治本之道的论点。

但是周国平在书中毫不客气地对严复的过失之处进行了批评,如严复认为中国传统中没有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概念,但他有时又引用儒学典籍对这一概念进行解释。他的这种做法是出于方便中国士大夫理解的目的,但我们会发现他对西方自由主义认识所产生的模糊与偏差。另外书中还对严复的翻译方式及内容取向提出了批评,如严复本人对“信、达、雅”的翻译原则的带头破坏,他优先采“用意译”的方式对西学著作进行翻译,有时为表达自己的见解而破坏了原作本意。

对于王国维,周国平的态度是同情的。他在书中写到王国维时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话,“王国维老实



《中国人缺少什么》
周国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到像火腿一般”,平生绝无可助谈兴的戏剧性表演。虽然关于他的自杀,成了时人与后人议论纷纷的谈资,但是议论的热度没有转向他对于西方哲学或者任何哲学的研究上。在严复译西学著作寻求中国救亡图存之路时,王国维也开始研读西方哲学。与严复不同的是,王国维认为中国人最缺失的是信仰,所以他对于西学的引进重点放在为人生寻求和建立信仰的形而上学上。他下苦功四次读康德,学习叔本华,研读尼采,梳理哲学观点,对主要的哲学问题进行独立的思考与判断。他痛批宣称哲学、文学艺

术等一切精神事物无用的论调,为精神价值作了神圣的辩护。关于精神文明,王国维提出了两个十分明确的观点: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由其所诞生的大哲学家、大文学家代表。二是和物质文明相比,精神文明的建设无比困难,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可惜在当时,这两个观点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这与国人重视实用的传统观念有极大关系。

对于王国维的受冷落,周国平并不觉得奇怪,在书中他写道:在一个注重实用的民族中,在举国关注物质层面之富强的时代,出现一个把精神价值看得高于一切的青年王国维,是一个例外,也是一个奇迹。直到今日,国人重实用轻精神文明的观念也并没有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奋斗于物质财富的积累,虽然每个人都听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口号,但却渐渐忘记了精神文明的重要性。更多的人在意银行账户的数字,却鲜有时间关注自己的精神价值追求。王国维在自己的文章中,常常谈到哲学与艺术的“无用之用”,说它胜于“有用之用”。而这些言论如同扔在棉花堆里的石块一样,在过去没有发出声响,在现代也一样被忽视掉了。

王国维后期由哲学转向文学,又一头扎进了经史考据之学中,周

国平认为这是他彻底绝望导致的,无论是时代背景抑或社会环境,甚至是哲学本身,都无法给王国维提供继续下去的希望,这与他本身的悲观被动的性格特点也是脱不开干系的。无论如何,拥有“认真的灵魂”和“认真的头脑”的王国维,在中国现代史上,作为第一个领悟到哲学之真义,弘扬了精神之神圣价值的人,留下了自己至关重要的一笔。

哈耶克曾说:自由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人生而不同,每个人的独特性是每个人的生命的独特意义之所在;而强制之所以可恶,正是因为它把人看成了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灵魂的东西。

在某些中国人眼里,只要有利可图,给婴幼儿喝的奶粉可以造假,给人注射的疫苗可以造假。人的生命一旦丧失了对自己灵魂的最低要求,做出什么样的行为都不觉得奇怪了。这是长此以往对于精神、信仰的缺乏所造成的恶果,也许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需要发生改变。但是周国平在书的后记中,还是发出了自己声音,表达了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心。他探讨了原因与出路,认为坚持纯粹的精神追求的人会越来越多,几代人之后,我们民族的精神素质一定会有所改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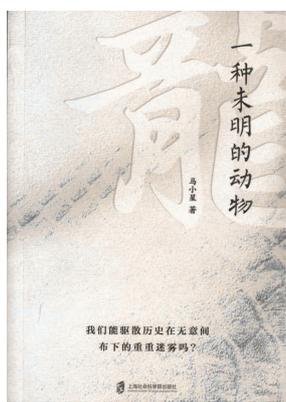
一本尝试揭开神龙奥秘的专著

——读《龙:一种未明的动物》

■翁长松

中华文化所崇拜的龙,究竟是实有其物,还是仅仅为艺术创作?自古以来,到底有没有人见过传说中的龙?围绕这个充满诱惑和困惑的话题,先辈学者们作出了不懈的探索,虽然大多陈陈相因难有突破,却也不乏灵光闪烁的猜想。例如,清末民初小说家吴趼人在论及“龙之有无”时说过:“窃谓当日必曾有此物,惟大而无当,其能力不足以自存,久已归于天演淘汰之中,故仅得留一名于世界,其物则已绝矣。”吴氏所言,固然是一种猜测,却也透射出近似直觉的洞察力。

笔者1993年曾在《上海科学生活》上发表过一篇《龙是什么?》,引述《左传》《周易》中的记载,认为龙很可能是古代居民见过的真实动物。所以笔者也是“历史上有龙说”的拥护者。但我在该领域的研究稍显零碎,浅尝辄止。而《龙:一种未明的动物》在这方面作出了新的探索,作者瞄准龙的话题作了深入持久并具开拓性的研究,打破了原来的藩篱,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该书有《云遮雾障 龙归何处》《被遗忘的历史记载》《来自松嫩平原的目击报告》《在神话与现实之间》《千古悠悠说“夔龙”》《龙、蛇、蛟、鳄异同辨》《鱼性未泯的古老动物》《龙无尺水 无以升天》《今人不见古时月》《从环境到政治的“指示生物”》等十章及末篇《结语:一个半醒半睡的梦》,认为某些动物的客观



《龙:一种未明的动物》
马小星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存在是一回事,将这些动物赋予何种人造的意义则是另一回事,如果说古代社会有关龙的种种传言带有梦幻色彩,那也只是“一个半醒半睡的梦”。

作者在后记中总结道:“我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力搜集散落在各类史籍中的‘坠龙’记载,而这些记载大多为以往的研究论著所忽略;二是开始重视民间有关‘见龙’的传说,并身体力行着手调查,尽管这项艰巨的工作仅仅是起步,做得还很粗浅。”为了揭开龙之真相,他从上世纪90年代初始,凭着个人的兴趣、智慧和毅力,长年沉浸于正史、笔记和方志中,孜孜不倦,寻觅资料;还不辞辛苦,长途跋涉,多次前往东北,采访当地一些曾见过

“坠龙”的乡民,古今对照,反复比勘,于是有了这本全神贯注追索“未明动物”的著作。

此书在本质上属于学术类著作,但在写法上却别具一格,生动活泼。全书先从一个流传在东北地区的民间故事《龙棚》说起,然后切入正题,层层推进,引人入胜。第二章《被遗忘的历史记载》,介绍了近50种古籍中关于龙的记载,以证明龙是一种在自然的长河中曾经出现过、却被现代学术界所忽视的珍稀动物。第三章《来自松嫩平原的目击报告》,则通过对一位老人的重点采访,指出直至上世纪40年代,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某处江滩,还有数百名群众亲眼目睹了这一罕见的巨型动物,并且依照自古以来流传的方式,重演了一幕救助“黑龙”的动人场景。在第七章《鱼性未泯的古老动物》中,作者认为我们搜索的目光,曾经长时间停留在现代爬行类动物的身上,却没有意识到龙很可能是一种跟原始鱼类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古代两栖动物。这一新观点,让人眼前一亮,颇有启迪。第十章《从环境到政治的“指示生物”》,进一步指出古人对于“四灵”的崇拜和宣传,其初期与生态保护的意识有密切关联,后来被纳入了政治伦理化的歧途,生物界的珍品才被改造成了政治界的“神物”。此书的附录部分,真实记述了以作者为首的几个人,在黑龙江松嫩平原寻访“坠龙”踪迹的生动历程。

通读全书,笔者的感觉是其史料扎实,内容丰富,论证严谨,叙述有理有节,常发前人之所未言,是一本具有研究新视角的好书。面对学术界既有的“权威性结论”,作者并没有畏葸不前。他独辟蹊径,开创了通过查阅古籍记载和走访目击者相结合的方法,尝试破解神龙之谜。从古文献记载中,他发现龙作为一种生物形象,对其习性的描写,具有相对一致性,如深藏、涉水、飞腾,而十二生肖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物形象,龙似乎也没有理由例外。再联系上世纪40年代发生在东北的“坠龙”事件的“现场目击报告”,作者最终得出结论:龙“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动物,后来渐趋绝迹,今已名存实亡”。

作者认为,人类历史本身常有难解之处,大自然也总会留下一些猜不透的谜。上一辈猜不透,留给了我们;我们猜不透,只好再留给下一代“龙的传人”。每一代都会有自己的新角度或新方法,每一代又都会留下唯有自己明白的深深的遗憾。对于神龙之谜,作者虽然有自己的见解,但他也并不武断。他认为只要生物考古学还没有提供有力的实证,他的说法也只是一种假说。这也说明了作者在学术研究上是严肃的,并不哗众取宠,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理念。这也是新时代学者们应当遵循的思想理念和学术风尚。